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周 膺 吴 晶 / 著

Hangzhou Jingji Shi

# 杭州经济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 杭州经济史

周膺 吴晶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杭州经济史 / 周膺、吴晶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61-6192-0

I. ①杭… II. ①周… ②吴… III. ①经济史—研究—杭州市  
IV. ①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7577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鹏  
责任校对 卢战伟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国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装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1.5  
插 页 2  
字 数 623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 任 沈 翔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其煌 史及伟 孙璐 李志庭  
何忠礼 陈 铭 林正秋 周 膺  
唐龙尧 徐吉军 顾志兴 顾希佳  
薛家柱

#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杭州的经济地理及其在中国经济地位的初步确立	9
第一节 中国文明起源阶段最大的综合经济体中心的形成	9
一、西溪湿地与良渚文化的经济地理构建	9
二、最具规模优势的稻桑农业经济体的崛起	14
三、石器、玉器、陶器、髹漆、丝织等工业经济的精致化发展	20
四、早期商业经济的萌发	30
第二节 杭州政区的形成与经济地位的再确立	36
一、隋唐以前良渚文化地域的再整合与“三吴都会”形势	36
二、东吴时期的经济地理开发	43
三、大运河的开凿与隋唐都市经济的开启	52
第三节 吴越国的保境安民国策与休养蓄势	67
一、控江保湖与经济地缘的拓殖	67
二、农工并举与重赋护国	74
三、远交近攻与通商	82
第二章 两宋的商工经济和商农经济与杭州经济的近世化	89
第一节 北宋的重商主义与杭州的经济转型	89
一、江南漕运的强化与杭州经济的都市化	89
二、国家重商主义思想改造下的杭州经济	95
第二节 南宋的社会重商主义与杭州经济体制的近世化	108

一、都市商工经济体系的形成	108
二、农村商农经济体系的构建	143
三、城乡双重城市化与商民社会的发展	159
第三节 “浙学”的影响与实用性发挥	168
一、两宋经济与“浙学”的伴生	168
二、事功伦理的合法化与事功潜能的释放	174
三、求理精神的实用性运作	178
<b>第三章 元明清杭州经济的近世化展开</b>	183
第一节 都市经济的维持与市镇经济的繁荣	183
一、元代都市经济的续兴	183
二、明清市镇经济的振兴	194
第二节 贡舶贸易与商舶贸易之间的都市经济	210
一、都市经济的国际化整合	210
二、都市的原初工业化	231
三、都市原初工业化的经济转型动力	249
第三节 稻桑经济的精深化	257
一、地域水循环系统的改善	257
二、稻桑作业系统的集约化和专业化	264
三、人工生态农业系统的构建	277
<b>第四章 外来因素作用下的晚清民国经济现代化</b>	285
第一节 商工经济的现代转型	285
一、商工一体化的机器大工业	285
二、现代服务业的萌发	314
三、旅游城市定位及其战略导向	343
第二节 现代经济组织的兴起	357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移植	357
二、江浙财团与金融变革	367
三、新式商会的自治发展	374
第三节 经济主体的现代转换	397
一、绅商主导的多元集合主体的形成	397
二、现代经济观的培育与普及	421
三、公民社会的萌芽	431
<b>主要参考文献</b>	457
一、外文专著、论文	457
二、中文专著、杂著	458
三、中文论文、杂文	480

# 绪言

以费尔南·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 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开创了综合性区域研究的学术风气, 美国学者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将其用于中国研究。施坚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 尤其是古代社会晚期的城市, 重点是沿海、沿江区域经济和地方市场结构等。这些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或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 (Information Systems of Source and Environment) 和中心地理论所做的研究, 后来被统称为“施坚雅模式”。施坚雅指出: “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 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 “这种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 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种空间层次的认识。这种空间层次的结构与前者相当不同, 我们称之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就一般情况而言, 在明清时期, 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现象更主要地是受制于它在本地以及所属区域经济层级中的位置, 而不是政府的安排。”<sup>[1]</sup> 施坚雅模式下的“区域” “是指由一些层级地位会发生变化的地区所组成的系统, 它们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上的较强的模式。一个区域, 其主要特点并不是内部的同质性 (尽管是在一些次等因素如方言上会相同), 而是在功能上的差异性”。“一个区域被定义后并不是指一个固定的和封闭的地区, 而是处于不同程度不断嵌套的体系中”。<sup>[2]</sup> 施坚雅综合考察商业贸易、人口密度、劳动分工、城市腹地等因素, 并结合流域分布图, 将晚期中华帝国划分为具有经济史意义的9个大区, 即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下游、长江中游 (曾从长江中游分出长江—赣江区域作为另一区域)、长江上游、西北、西南、华北、东北。这种大区有着传统的相对稳定的地理区域界限, 除少数外一般以江河流域盆地分水岭来界定。在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情况下将江河流域作为地区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来考虑尤其合适, 而在商工经济占据主

<sup>[1]</sup> 施坚雅主编: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文版前言, 叶光庭等译, 中华书局2000年版, 第1页。

<sup>[2]</sup> 林达·库克·约翰逊 (Linda Cooke Johnson) 主编: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导言《长江下游的城市与区域》, 成一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7页。

导地位的早期现代经济发展阶段这种决定作用仍然延续着。事实上，大区之间也是沿着自然的交通运输通道建立交流纽带的。大区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中心城市不可替代的领导角色和作用。不同大区的中心城市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从而保证大区的相对独立性。因此，长江上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和其他地区的城市除了在国家经济中的相互作用以外，也被认为是半自治的。在上海崛起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苏州、越州、杭州等城市在长江下游大区先后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五代吴越国以前，吴、越总体上处于分治状态，两浙的区域中心在苏州和越州。吴越国统一两浙后，两者的中点杭州成为区域中心。杭州自此以后经济社会地位上升较快，在较长时间里成为统领两浙的大城市。不过由于当时对吴尚未获得完全的控制权，杭州对北部的辐射还十分有限。南宋临安不仅获得了这种控制权，而且成为整个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其资源、交通优势自不待言，市场优势尤为明显，因而不仅经济容量空前增大，而且经济发展模式也被推向新的高度。元代以后，全国的政治和经济重心北移，南北交通干线主要为北方服务，而海外贸易拓展后商路得以重组，杭州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至晚清民国时期上海成为区域性直至国际性大都市以后，杭州虽然继续发挥较强的区域作用，但由于因自然因素划定的地理区域界限逐渐被打破，经济功能发生了较大改变，不再作为区域经济中心而是以特色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城市发展。由于杭州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发展均有区域特征，因此本书始终将杭州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形态来研究。

施坚雅模式是一种结构—功能分析模式，它用中心地区（Core）和边缘地区（Periphery）等核心概念分析这些大区以及城市体系，将中国的市场体系分为8个等级的区域经济中心模式，从上至下依次为中央首府、地域首府、地域城市、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每个区域以各种资源在中心区的集中为特征。中心区一般在地理、交通、商业化程度等方面均较边缘地带发展水平高，有明显优势。就城市之间的平均距离而言，中心区小于边缘地区；就市场规模以及商业服务水平而言，中心区的优势也大于边缘地区。中心城市在整个区域体系中具有辐射和构造作用，是区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心城市下有市镇（Market Town）和乡村，它们在复杂而庞大的经济体系中发挥“中心点”的作用。依托从最基层的乡村级别开始经济联系，层层向上构成完整的经济等（层）级，最终形成大区的经济层级结构。大区经济的不同特征实际上反映了处于不同层次的子系统的属性。每一个“子体系倾向于孤立独处于大区边缘地带，在核心区内也是交错存在的，但在整个等级结构中，子体系都是面向核心区方向敞开的……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带较核心区松散……归根到底都可看成各种运动的集合……任何体系中都无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处于不断的流动、相互影响与反馈的过程之中”<sup>[1]</sup>。经济层级

<sup>[1]</sup>施坚雅：《中国历史的结构》，载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中列为地方城市或更高级城市的大多数中心地同时也是行政治所。“它忠实地反映着各地区的核心—边缘结构、治所在经济中心地层次中的级别、管辖范围和各种管理任务的相对特色。”<sup>[1]</sup>这种结构可能把形式一致性因素强加于城市，但在实际上，地方行政表达而不是压抑了城市体系内功能上的差异性。由此可以看到，施坚雅模式不仅是一种大区研究理论模式，而且是城市—乡村的一体化研究模式。事实上，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两个重点。前者主要关涉中国乡村社会，以《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为代表；后者主要关涉中国的城市化，以《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为代表。而区域体系理论是集市体系理论的拓展和深化，它以德国地理学家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为主要研究方法，同时吸纳了美国社会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的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美国地理学家乔治·金斯利·齐普夫(George Kingsley Zipf)的等级—规模学说，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综合性研究转向区域性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斯波义信1988年出版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将施坚雅的静态市镇网络模型发展为动态生态模型，他认为：“8—13世纪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为：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sup>[2]</sup>也就是说，宋以降江南社会带有更多的“都市化文明”特征，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是江南社会与此前的汉唐社会和同时代的华北社会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宋代社会特别是江南区域之所以显现出更多的“都市化文明”特征，则是由宋代江南经济变革特别是农业变革、交通变革、商业变革等一系列变革促成的。美国学者马润潮(Laurence J. C. Ma)《宋代的商业与城市》一书指出，宋代以前中国的城市在性质上均以行政为主，城市商业仅为其规模有限的微小附属而已。宋代以快速的经济成长与商业发展而著名，此时商业力量之兴盛使城市的性质显著改观，城市除了作为行政所在地之外，均出现有史以来未有的商业化。杭州在宋代以后除发挥政治作用外，还以都市化的方式将整个区域各个层级的经济整合在一起。由于政府放松了经济管制，使城乡市场体系较快发展起来。最直接的后果是城市经济由工商经济模式转换为商工经济模式。商工经济即以商业为主导的手工业经济。在新的商业体系推动下，城市手工业不断突破原有的市场边界和运作极限暴发式发展。与此同时，农村的小农经济或农商经济模式转换为商农经济模式。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并不断体系化发展。其中镇市发展日渐成熟，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成为农村区域市场的中心。与城市一样，许多镇市形成了包括综合市场、专业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等不同形式和层次的市场构成的市场体系。它们既建基于广

<sup>[1]</sup>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载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sup>[2]</sup>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

阔的农村腹地之上，又有功能强大的复杂结构和形态，以商业上的主导优势将区域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等多种产业集合在一起，构成小规模或初级形态的城市。以镇市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附近的都市或中小城市，但也形成了与都市一样的具有远地辐射功能的自主性贸易圈。这个贸易圈的优势主要在于能提供粮食、手工业原料以及一些初级手工业产品，具有都市经济无法替代的功能。镇市经济不会像都市那样总体上商工化或非农化，它的主要作用是推动农产品的市场化，因而更多的只是生产和经营方式越来越接近于都市产业形态。在商工经济与商农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南宋杭州城乡形成了两个空间位置和性质均有所不同的经济圈，即都市商工经济圈与镇市商农经济圈。它们既相对独立发展，又互为市场，互动互生。与此互为因果的是较为明显地出现了城市都市化和农村城镇化两种不同的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变得十分普遍，并且在此后形成超稳定的农村经济和聚落常态化延递模式。由此出现了多重社会动力耦合，即商工经济与商农经济的耦合、都市化与城镇化的耦合、商工经济与都市化的耦合、商农经济与城镇化的耦合。这种耦合效应在明清时期进一步放大，使杭州的农村经济和农村城镇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弥补了城市经济扩张速度下降对区域经济繁荣贡献减少的缺口，使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阐释“唐宋变革论”时指出，唐代与宋代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sup>[1]</sup>这就是著名的“内藤假说”(Naitō Hypothesis)或“宋代近世说”。明代史学家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吏以仁为治而苍鹰乳虎之暴无所施于郡国，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结驷之侠无所容于闾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sup>[2]</sup>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来说，南宋可视作“后三代”的总结和完成。而且，不仅明代“宋其三变”尚“未极”而“治不得不相为因”，一直到晚清民国时期乃至当代，宋代开始的社会演变仍然在延续。严复尝谓：“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sup>[3]</sup>

从词源考古学方面来说，日中两国的“近世”一词均源于西语“Modern”。汉语语境“近世”与“近代”含义庶几相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使用“近世”一词频率远大于使用“近代”

<sup>[1]</sup>内藤湖南：  
《概括的唐宋时代  
观》，载刘俊文主  
编：《日本学者研究  
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1卷（通论），黄  
约瑟译，中华书局  
1993年版。

<sup>[2]</sup>陈邦瞻、冯  
琦、沈越：《宋史纪  
事本末》，中华书局  
1977年版。

<sup>[3]</sup>严复：《严复  
集》第3册《与熊纯  
如书·五十二》，中  
华书局1986年版。

一词。<sup>[1]</sup>但在日语语境中，“近世”与“近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sup>[2]</sup>内藤湖南曾在多处使用“近世”、“近代”等词语，而“近世”一词在日语语境中使用具有灵活性，既可以指称“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也可以指称“封建后期”（Late Feudal）。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历史学研究会派）围绕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曾激烈争论。京都学派从“早期现代”即“中世”向“现代”转折的意义上解释，而东京学派则从“封建后期”即封建社会向“现代”过渡的意义上理解。不过“东京学派”的中国近代观是“鸦片战争视角”，故其历史分期并无“近世”概念。<sup>[3]</sup>在英语世界，“近世”一般译为“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但宫崎市定在1955年用英文著述的时候用Modern来指称。<sup>[4]</sup>内藤湖南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外部、内部视角提出宋代近世说的。他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一文中指出：“历史学家通常划分时代，并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名称。这些名称并非表示只是站在现代的时代之上，以较远的时期为上古，其次为中古，以最近的时期为近世，等等简单的意思。”<sup>[5]</sup>这种上古、中古、近世的时代划分本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意识。在中世纪，因神学思想垄断社会的时间意识，尘世最高价值的设准被推延至彼岸，故无此种历史—时间意识。而彼时欧洲主流史学观为古—今（Antiqui-Moderni）模式，其所谓古—今只构成一种生存性的张力，并非年代学的时间对比，乃指生存样式或生活品质的对比。就生存性时间而言，Modern是不断发生的事件。此种历史—时间意识萌蘖于文艺复兴早期，当时用光明与黑暗、白天与夜晚、清醒与睡眠赋予文艺复兴与之前的时代以价值判断。意大利语“复兴”（Rinasdita）一词本具有价值判断的意味。<sup>[6]</sup>在此意义上，历史出现了断裂，现在（文艺复兴）迥异于过去（中世纪），也优于过去。这种视文艺复兴为新的开始的意识与时间的共谋，赋予“现在”以进步意识，即具有优于此前的中世纪的断裂感。由此又形成了“Antique-Medieval-Modern”三段式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后来逐渐成为欧洲史学界的主流观念。<sup>[7]</sup>随着“理论的旅行”被播散到亚洲，日本较早接受了这种观念。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即直接受此影响。但内藤湖南也有独立的思考，他以一种内部文化历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通过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若一棵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却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sup>[8]</sup>就共时的维度而言，日本、欧洲文化的开放性较强，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而不断发展，中国文化却历数千年而自然演进以至自成典律，有着自身的发展理路。他甚至用这种思想来划分整个中国历史：

<sup>[1]</sup>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

<sup>[2]</sup>一般而言有两个意向：一则指近代以前的一个时期，一则指近代。日本辞书《广辞苑》云：“（1）近世（Modernage）：历史的时代划分之一。承续于古代、中世以后的时期。在广义上与近代同义，就狭义言则与近代有别，多指其以前的一个时期。一般在西洋史上指文艺复兴以降，在日本史上特指相当于封建制后期的江户时代（也有包括安上桃山时代的）。”“（2）近代（Modern Age）：历史的时代区划之一。广义上与近世同义，一般系就承续于封建社会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在日本史上通常指称明治维新至太平洋战争结束的时期。”（《广辞苑》订补版，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603、604页）。

<sup>[3]</sup>岸本美绪：《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黄东兰译，《新史学》第4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

<sup>[4]</sup>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3辑，刘宁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sup>[5]</sup>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马彪等译，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138页。

<sup>[6]</sup>Theodor E. Mommsen, *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 "Dark Ages"*, *SPECULUM* 17 (2), 1942.

<sup>[7]</sup>William A. Green, *Periodization in European and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3(1), 1992.

<sup>[8]</sup>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中国上古史章节，夏应元选编并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上古时代（中国文化形成并向外部发展的时期）；

从东汉后半期到西晋——第一过渡期（停止向外发展时期）；

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期——中世（外部种族的势力反弹而及于中国内部的时期）；

唐末五代——第二过渡期（外部势力在中国达到顶峰的时期）；

宋元时期——近世前期；

明清时期——近世后期。<sup>[1]</sup>

<sup>[1]</sup>内藤湖南：  
《中国史通论》中国  
上古史绪言，夏应元  
选编并监译，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版，第5—6页。

就历时的维度而言，内藤湖南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立发展的，长期以来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和坚韧性。这种特性使其成为超稳定系统。纵然遇到外来刺激，往往都是我化外而非外化我。因此，中国的现在可以借由过去来加以省察，中国的未来同样由其固有文化决定。内藤湖南曾从中国历史文化殷鉴的角度回答彼时中国的问题：彼时中国风雨飘摇，革命呐喊不绝于耳，但大多数有识之士沉浸于情感的奔突、跳跃之中，而乏善理性的思索以设计后革命时代的未来。中国“告别革命”之后，国家政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并非为欧风美雨所左右，而是内蕴于中国文化自宋代以降的自然发展进程。根据对宋代以后平民力量高涨的识断，他断言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必然朝着共和方向发展。而事实真的不幸被言中。<sup>[2]</sup>如他所说：“中国人是会极大地认识到自己的优越性的国民，他们现在学俄国也好，在此之前学日本的国会政治也好，最终，中国人将认识自己的优越性，认识到还是由来已久的中国式的做法最为合适。这是由中国近代生活来考察中国命运而得出的极贫弱的结论。”<sup>[3]</sup>

<sup>[2]</sup>妥建清、赵  
建保：《重视内藤  
湖南的“宋代近世  
说”：以思想文化面  
向为中心》，《人文  
杂志》，2012年第4  
期。

<sup>[3]</sup>转引自钱婉  
约：《内藤湖南研  
究》，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119页。

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又是建立在“多元近代”观基础上的。他在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的时代形式划分时始终认为，各个时代都有着与之相应的内容，而于此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基础之上揭橥多元近代。“譬如西洋的近世概指文艺复兴以后的时期，包括一般民众的力量是否增长；伴随着新土地的开发，经济上有何变化；社会组织是否出现变化等等内容。”而日本的近世则肇始于足利末期或镰仓时代。“在日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主张在进行类似的时代划分时，以上述内容为基准较为妥当。也就是说，并非只把开国（门户开放）的这50年称作近世，而应把诸如武家的勃兴、平民势力的增长等社会组织在根本上出现的变化的时代划为近世。站在这一视点，有人认为近世始于足利末期，有人则主张应追溯至镰仓时代。”“对中国，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划分。一般人比较单纯地把明代或是清代以后称为近世，这是门外汉的看法。可是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观点上，就应该看到所谓近世是有其内容、有其意义的。由此可以追溯到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1000年前到800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纪。这样看似无不妥。”<sup>[4]</sup>在内藤湖南看来，近世的实质是平民势力的高涨，虽然此实质因各个国家的政治、经

<sup>[4]</sup>内藤湖南研究  
会编：《内藤湖南  
的世界》，马彪等  
译，三秦出版社2005  
年版，第138、139  
页。

济等因素相异而有所不同。尽管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一实质性内涵的规定却是相当有见地的。包弼德《唐宋思想的转型：以思想变化为主》一文指出，宋代近世说以现代性的目的论述为指归是不当的。<sup>[1]</sup>但事实上内藤湖南的“近世”并非今天意义上的“现代”，它是介于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历史形态，即早于“现代”之“近代”一词的本义，或也可用“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来表达，大体相当于富兰克林·F. 门德尔斯（Franklin F. Mendels）所说的“原初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阶段。而事实上中国至今没有完成现代化。在此意义上，宋代近世说基本可以成立。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平民势力发展，或者平民社会、平民经济的发展，总体上没有超出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发展水平和成就同样也没有超出宋代。即便今日，除经济总量有所增长外其余似也如此。

本书的写作是以宋代为中心展开的。而通过对史料清理和解读，则以宋代近世说为发生框架似最为合理。故总体上厘为4章，第一章为宋以前的古代，第二章为两宋的近世化，第三章为元明清的近世化展开，第四章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问题。杭州经济自南宋开始演变为世俗平民经济即本书所谓的从国家重商主义经济转化为社会重商主义经济，与此前的封建地主经济有巨大差异。不仅生产的动力更多地转向社会，生产的目的也开始更多地导向社会。经济形态则前所未有地多样化。土地日益市场化，所有生产资料 and 商品也不断市场化，使经济整体在商业基础上重新构建。唐代虽然货币铸造一直不断，但流通量相对较少，不少商品在用货币表示价值之余仍以绢布来交换。宋代不仅以铜钱代替绢布等，货币流通量也增大，并盛用纸币。南宋时纸币发行量较大，并衍生了一些早期金融产品。此后逐渐以货币租税取代实物租税，不仅使经济结构可以按照价值规律优化，而且将金融纳入经济的中心环节。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年）一书指出，若就狭义江南即长江三角洲而言，从13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南宋后期到清朝中叶这6个多世纪，是一个经济成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即从以前的数量型“广泛型成长”转变为质量型“斯密型成长”。<sup>[2]</sup>这种经济制度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的潜能，一方面养活了高增长的人口，并且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封建政权摆脱了经济危机。在此基础上，“市民”、“农民”等概念及其主权意识逐渐清晰并强化起来，从而极大地推动着社会进步。但这种近世化发展总体上还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内藤湖南所谓的中国内部发展历史观有合理性，但不能成为杭州或中国未来发展的宿命。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外来冲击和促动，虽然带来了突发性增长，但在质性上并未走出近世。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和公民社会没有建立起来，更无从说后现代。因此，本书又特别重视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问题，将它作为另一个写作立足点。而在这种意义上，宋代突变性的近世化仍然别具启示价值。

<sup>[1]</sup>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3辑，刘宁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sup>[2]</sup>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年），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9页。



# 第一章 杭州的经济地理及其在中国经济地位的初步确立

## 第一节 中国文明起源阶段最大的综合经济体中心的形成

### 一、西溪湿地与良渚文化的经济地理构建

杭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浙江省的西北部，现辖西湖、上城、下城、拱墅、江干、滨江、萧山、余杭、富阳9个区，临安、建德2个县级市，桐庐、淳安2个县。主要人类聚居区处于天目山及以南延伸山系的钱塘江凹槽地带西北岸，市区则萧山、滨江两区处在钱塘江东南岸。自位于西北部的临安市起至市区余杭区又有东苕溪的水动力作用。钱塘江流域、苕溪流域和天目山及以南延伸山系发现了大量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遗存，包括许多早期人类定居点或聚落。

1962—1963年、1974年建德市李家镇新桥村乌龟洞先后两次发现距今约5万年的晚期智人“建德人”牙齿化石，2000年桐庐县印渚镇延村钟乳岩石洞穴发现距今2—1万年的古人类不完整下颌骨和前额骨各1件、头骨印模1件。<sup>[1]</sup>虽然堆积未发现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文化遗存或遗迹，如用火遗迹、生产工具等，人类化石可能是自然力（包括动物）的作用由洞外搬运而来，因而不能将它们确定为人类居住遗址，但却提供了杭州甚至整个中国东南地区早期人类存在的线索。它们可以与后来在天目山周缘发现的大量旧石器及人类定居点前后佐证。

旧石器时代杭州的早期人类活动主要集中于钱塘江上游流域或天目山谷地。先民利用流域大通道和山麓谷地进行经济性开发，在自然选择中发

<sup>[1]</sup>黄正维、孟子江：《浙江哺乳动物化石新产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1期；韩德芬、张森水：《建德发现的一枚人的犬齿化石及浙江第四纪哺乳动物新资料》，《古脊椎动物与人类》1978年第4期；石丽、金幸生、程海、沈冠军：《浙江桐庐人类头骨的轴系年代》，《人类学学报》2002年第4期。

展了原始文化。这种态势在新石器时代有所延续，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文明起源阶段则逐渐向钱塘江出海口（当时的出海口更接近杭州）或位于今萧山区的湘湖湿地和位于西湖区、余杭区的西溪湿地以及位于市中心的西湖湿地移动，杭州由此成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现今的湘湖湿地位于钱塘江东南岸，由于历史上的钱塘江在这一带一直是一条动线，湘湖湿地在当时或许处于钱塘江西北岸。也有可能湘湖湿地的早期人类来自钱塘江东南岸宁绍平原周缘的山区。

湘湖湿地、西溪湿地和西湖湿地是自全新世以来杭州形成的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在它们之上建立起来的文化或文明分别成为不同时期的主体性地理文化体。其中新石器时代早期湘湖湿地较发达，跨湖桥文化达到当时的文化高峰；新石器时代晚期或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则西溪湿地最发达，孕育了中国5000年文明史最重要的实证之一的良渚文化；西湖湿地在历史时期最发达。

西溪湿地是环太湖地区冈身形成、太湖海湾（杭州湾）遭遇封堵后，在钱塘江和东苕溪水动力作用下冲积、湖积、沼积而形成的水网平原，从机理上说应当称苕溪湿地。由于西湖湿地形成较为晚近，原先杭州市区的人类活动除湘湖湿地外主要集中在西溪湿地。从大的概念来说，西溪湿地延伸至整个杭嘉湖平原，或与环太湖平原连为一体。这一区域在海平面下降的过程中出陆形成的时间有先后，而杭州由于处于天目山边缘，相对地势较高，所以当是最早成陆的地区。从狭义的概念亦即西溪湿地的杭州部分来说，其较早的范围在1000km<sup>2</sup>以上。东至钱塘江，西至余杭区余杭街道、中泰街道，南至法华山一线几十里山峰北坡，北至余杭区瓶窑镇、良渚街道、塘栖镇直至湖州市域交界区，约含现在的西湖区留下街道、蒋村街道、三墩街道、古荡街道、翠苑街道、文新街道、北山街道、西溪街道，拱墅区所有街道和镇乡，余杭区余杭街道、中泰街道、闲林街道、仓前街道、五常街道、瓶窑镇、良渚街道、仁和镇、塘栖镇、运河镇、临平街道、乔司街道等，亦即现在杭州市区钱塘江西北岸除西湖湿地以外差不多所有部分。西溪湿地在第四纪地质作用下逐渐演化为河流纵横、具有生物活性的沼泽平原，具备得天独厚的农业文明发展条件。

东苕溪原来向东流入钱塘江，其北沿和钱塘江以东的三角地带即良渚遗址区亦即现今余杭区良渚街道、瓶窑镇、仁和镇一带较早形成冲击平原，成为西溪湿地最早出陆的部分。最早的杭州市区即形成于此。其时现在的杭州市中心包括前述西湖区、上城区、下城区、拱墅区和江干区大部尚在水下，或是不可居住的沼泽地。当时整个环太湖平原的陆域化程度不如良渚遗址区，居住和生产条件也就有所不如。西溪湿地位处浙西北丘陵河谷向浙北水网平原或者说环太湖流域的过渡区，不仅陆域化水平较高，而且兼得丘陵河谷和水网平原两种地缘优势，既可大面积开发水稻种植区，又可以丘陵河谷作为抵抗自然灾害的强大屏障。自新石器时期以来，



其地理文化特别是良渚文化先民利用和改造了西溪湿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当时中国最优越的文化发展地缘，从而使良渚遗址所代表的古杭州或良渚古城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环太湖地区的经济、宗教和政治中心，即良渚古国的首都。

良渚文化有效利用了地缘优势，综合了前述史前文化的优秀因子，在特殊的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刺激下，发展出当时中国最为繁荣昌盛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创造了值得世界性关注的伟大文明。良渚文化先民十分重视对生态环境的观察和化用，他们用智慧来认识和利用自然因素，对环境进行适度改造，合理安排森林、农田和建筑群，将赖以生活的大地建成优良的生态家园，使人类与动植物群构成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良渚古城不造作、不武断，而是充分地尊重、接应、导引生态因素，没有势利地成为唯我独尊的统治自然的工具，而是与自然系统构成良性循环关系，形如天然佳构。

学术界一般以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为地理分布来讨论杭州湾南北两岸的史前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杭州湾两岸的文化主体均转向水网平原地区，主要表现为水网平原型文化，但也各有特质。杭州的行政区域跨钱塘江两岸，其早期文化兼具南北两种因素。良渚文化进行了极为有效的地缘性综合创造。良渚文化先民尤其善于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也特别乐于进行持续不断的发明创造。他们的原创、首创和独创精神是杭州人民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杭州湾北岸的杭嘉湖地区由杭嘉湖平原及天目山支脉两个地理单元组成。杭嘉湖水网平原是浙江省最大的平原，面积约6450km<sup>2</sup>，位于太湖平原的南侧，与东部的上海、北部的苏锡常等平原一起构成北抵长江、南达钱塘江、以太湖为中心的环太湖平原。除少数突出的孤立山冈外，杭嘉湖平原绝大多数区域属于典型的平原地貌。其比较开阔的地理空间、相对单调和分布不平衡的野生资源使这个地区的群体面临较大的人口压力，当时的人倾向于更多地依赖农业生产。这里平坦的地貌也恰恰适合于稻作，而且还便于人群集结发展劳动密集型经济，从而加剧社会复杂化进程。这一地区的新石器以来文化大系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嘉兴市马家浜遗址命名的马家浜文化维系年代较长，年代距今7000—6000年，以大面积稻作农业作为定居生活基础，渔猎、畜牧和采集为其补充。大量使用磨制石斧、石镞、石刀、骨耜、骨镞等生产工具，出现有孔石斧（钺）。分化出夹砂和泥质两大陶系，并以红陶和表红胎黑的泥质陶为特色，代表器型有腰沿釜、炉算（长方形横条陶烧火架）、喇叭形圈足豆、牛鼻形耳罐、圆锥形足鼎等。已使用玉器，以玦为主，璜少见。盛行俯身葬，随葬品少而简单。<sup>[1]</sup>比较重要的马家浜文化遗址除马家浜遗址外，还包括浙江嘉兴吴家浜、湖州邱城、桐乡罗家角、杭州吴家埠，江苏常州圩墩和潘家塘、吴江袁家埭和广福村、苏州草鞋山和越城、张家港东山村和

<sup>[1]</sup> 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吴汝祚：《马家浜文化的社会生产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